

郭延礼 编著



解读秋瑾

上册

鹧鸪天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难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山东教育出版社

我与秋瑾研究（代前言）

秋瑾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女革命家、女英雄和女诗人，她一生光辉的业绩，已用自己青春的鲜血书勒在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同时也深深地植根于全球亿万人民的心中。

我结缘秋瑾是出于对这位革命先烈和女英雄、女诗人的崇敬。早在大学时代，我通过阅读秋瑾的诗词便为她的爱国思想、革命精神和崇高的人格所感动。20世纪60年代初（1961—1962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中国近代文学史，导师是著名学者赵景深教授。1962年春节后，由赵先生介绍，我开始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搜集近代文学史料，并拜访一些作家、学者。南京大学的汪辟疆教授和苏州的周瘦鹃、范烟桥先生，就是这次拜访的。去杭州一地，主要是到浙江图书馆访书，重点放在秋瑾及其女友徐自华、吴芝瑛等人身上。临行前，赵先生给我写了一封私人介绍信，让我去拜访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夏定域先生。一天上午，我沿着美丽的西子湖畔，去西泠凭吊了秋瑾墓和岳坟，然后到了浙江图书馆。夏先生看了赵景深先生的信，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夏定域是国内著名的文献目录学专家，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找到了浙江图书馆所藏的许多有关秋瑾和辛亥革命的书，夏先生并破例允许我将这些书籍带回旅馆。我记得当时是住在杭州的清泰旅馆。回到旅馆，将在路上买的晚餐很快解决，便进行阅读、摘抄。那时没有复印机，一切都是靠手抄，大约这一夜几乎未睡觉。杭州之行，收获很大，也萌生了我准备研究秋瑾的想法。一周后回到上海，我又利用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查找并抄录了若干有关秋瑾的资料。我记

得秋瑾之弟秋宗章撰写的《六六私乘》、《六六私乘补遗》、《记徐寄尘女士》都是这个时候自费请上海图书馆特藏部委托专人代抄的。

1962年暑假，我进修结业后返回山东大学。1962—1963学年第一学期便为中文系1959级（时为四年级）的学生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史。当时既无统一的教材，也无“近代文学作品选”这类的书。我自己编讲义、编作品选，自然也接触到秋瑾。不久，冯沅君先生接受高教部的委托，由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和山东大学冯沅君教授主编一部《中国历代诗歌选》，分上下两编，上编由林先生主编，下编由冯先生主编。冯先生主编的宋元明清近代部分，当时山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教师有六七人参加，我担任近代部分的全部注释工作，其中也有秋瑾的诗。自1963年，我便利用教学之余编选《秋瑾诗文选》，书稿在冯沅君先生的指导下，于1964年初夏写成，送人民文学出版社审查。如所周知，1964年已处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正值横扫封资修的极左思潮泛滥之际，这样的书是很难出版的。

我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为我保存了这部书稿，否则在我下放农村遭受“四人帮”迫害时，肯定它也“在劫难逃”。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函，对《秋瑾诗文选》给予充分的肯定，并通知我：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此书，让我对前言部分作点修改。我当时还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教中学（1965年暑假“下放”于此），书籍大部分毁于“文革”中，无条件进行大的修改，通读全稿后，改正了若干处，然后寄人民文学出版社审查，该书终于在1982年4月出版。

1982年出版的《秋瑾诗文选》，只是一本不足200页的薄薄的小书，它却饱含了我人生经历中的一段辛酸和苦难。但它又是一枝报春花，迎来了我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次收获。我在《秋瑾诗文选·前言》结尾处写道：

这本小书写成于一九六四年初夏，当时我正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教中国近代文学史，在先师冯沅君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注释秋瑾诗文；许多疑点几乎都是先师耳提面命。书写成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冯先生又为我审查了除词选注释外的全部稿子；当时远在青岛休养的我的老师黄公渚教授抱病审查了词选注释的稿子。岁月不居，时间过去了十五年，今天当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帮助再次修改这个小选本时，两位老师已远离人间；而我在十年浩劫中因反对“四人帮”，也颇有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借此书出版的机会，谨在此向先师冯沅君教授、黄公渚教授表示我最真诚的悼念！

是的，这是一段肺腑之言，也可想见我当时身居农村、在初冬深夜昏暗的灯光下写这段文字时的悲凉心境。我又想起审查这部书稿的我的两位老师。从某种意义上，两位先生的遭遇都比我更苦、更惨，他们没有等来学术的春天。

自1964年在两位先生的教诲下完成书稿到现在，又近五十个春秋，两位先生的声容笑貌时常出现在我的记忆中。五十年来，先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学生慈父慈母般的关怀，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我，激励着我。每当我心态浮躁、做学问懈怠的时候，或者因在学业上的点滴进步而有些飘飘然的时候，两位先生仿佛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促我省悟，促我前进。

《秋瑾诗文集》的出版时间比我写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龚自珍诗选》（1981年7月齐鲁书社出版）晚九个月，但我的第一本书仍然要算《秋瑾诗文集》（1964年初夏完稿）。它记录了我对秋瑾的崇敬及真诚的爱。虽然这本小书还是我在科研起步阶段一份不成熟的作业，但它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获得了近代文学研究界同行的好评和读者的喜爱。

《秋瑾诗文集》是秋瑾文学作品的第一个选本。全书由“文选”、“诗选”、“词选”、“歌选”四部分组成，另有附录“秋瑾年

谱简编”。该书选秋瑾诗文86题94首。在作品编排上，我打破了此前十多种秋瑾诗文集编次紊乱的现状，每一文体均采用编年的体例。诗选部分又分为三个时期，每一时期再依作年先后编次（同一时期中再分体排列：先古诗、次律诗、后绝句）。这种编排对读者了解秋瑾思想的发展、创作的变化，以及生活与创作的关系都会有些帮助。这一点受到学术界的肯定。秋瑾研究专家郭长海教授评论《秋瑾诗文选》，称“它是秋瑾作品自有编集以来的第一个编年的诗集”。他说：“秋瑾诗词，80年来向无编年本。在社会上流传的十几种秋瑾集子中（包括解放后出版的《秋瑾集》）不仅没有编年，甚至都不按旧的分体排列法编排，其错杂、混乱程度是相当惊人的。若干年来，人们一直在使用这种本子，不要说初学者，即令研究者，也甚感不便。郭延礼同志在60年代初期就进行了秋瑾诗词的编年选注工作，20多年来，获得了极为可喜的成果。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秋瑾诗文选》，便是他多年的心血和辛勤劳动的结晶。他把原书次序打乱，细加考索，按时间的先后，重新整理……应当说，这在秋瑾诗词的研究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郭长海还指出《秋瑾诗文选》在写作背景、本事的考证上下了很大功夫，“他把秋瑾的诗词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钩稽史实，探索本事，这就为初学者乃至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在对秋瑾诗词内容的诠释上，“特别是对某些典故的探原工作做得比较认真，其中不乏独特见解”。^①岳棣先生在《简评〈秋瑾诗文选〉》中指出本书的特色有四：一是“立论平允，选目精当”。“书的‘前言’，是一篇扎实深刻，见解独到的学术论文……选注者较好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秋瑾及其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价，既指出秋瑾思想及其诗文的菁华所在，也具体分析了秋瑾所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二是“探幽发微，多所创获”。“一般注本最大诟病是该注而不注，甚或避难就易。本书的选注者处处为读者着想，避免了这些毛病。最可贵的

^① 郭长海：《秋瑾事迹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368页。

是注释多有创见发明”，并举二例说明之。三是“考核精确，言必有据”。四是“文字简洁，雅俗共赏”。^①此书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后，受到学界和读者广泛的好评。

《秋瑾诗文选》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尽管它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对我影响很大。通过此书的写作，它不仅让我初步掌握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步骤，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我进行学术研究所必备的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这两点一直是我尔后从事学术研究所遵循的两大基本原则。

二

我的第二本研究秋瑾的书是《秋瑾年谱》。《秋瑾年谱》的编写，如果从1962年的搜集资料算起，到出版的1983年，其间经历了整整二十年。在秋瑾研究工作断断续续的二十年中，我想尽可能地占有丰富的资料，为此，我先后去过上海、南京、杭州、绍兴、北京、天津、开封等地十多家图书馆、博物馆，还信访或面访过湖南博物馆、厦门图书馆、福建云霄县政协、浙江南浔镇人民政府、浙江嘉兴县统战部，以及秋瑾的亲属和乡邻。为了给今后从事秋瑾研究工作的同志提供方便，凡较为难寻的书籍和资料，我均于附录《秋瑾年谱征引书目》中注明藏于何处，因为我自己曾经为找这些书不知跑了多少路。举个例子说吧，195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耀庭撰《秋瑾》，因为当时印数只千余册，许多图书馆均未收藏此书，我曾查遍了山大、复旦、上海、浙江图书馆以及绍兴鲁迅图书馆均无此书，直到1981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鲁迅诞辰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才在北京图书馆看到这本书。至于解放前出版的书籍，特别是辛亥前后的一些史料更难找。秋宗章解放前撰有《秋女侠史实考证》一文，我找了二十年不知下落，1981年才知道它收在易鹰编的《身价集》中，而这个线索则是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山东

^① 岳棣：《简评〈秋瑾诗文选〉》，《东岳论丛》1982年第5期。

大学校友魏同贤学长的帮助下，从该社数百件《秋瑾集》出版档案材料中找到的。资料公开、学术交流，给后人提供研究方便，本是学术进步应倡导的学风，并无“保密”和“奇货可居”之必要。郭沫兰在《〈秋瑾年谱〉评介》中说：郭延礼先生的《秋瑾年谱》更突出的优点，“即‘资料公开’。作者研究秋瑾，为搜集资料历尽艰辛，深知资料得之不易，如果只为自己着想，满可以据为‘私有’，甚至‘保密’，居为‘奇货’。然而作者不是这样，而是从推动秋瑾研究的大局出发，从革命事业着想，设身处地，给他人提供研究方便，把征引之408种书目全部列出，凡有罕见者均注明藏处，附于《年谱》之后。这种光明磊落的学风，是繁荣社会主义学术研究所需，值得大大提倡的”^①。

《秋瑾年谱》正式动手撰写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我正在一所农村中学教书，时间是很紧张的。我主要利用工作之余（每天晚十点之后的深夜），以及周六的下午（学生和教师法定回家时间）和星期天写作。初稿在1978年告一段落，但限于资料，有很多问题难以下结论。比如秋瑾的生年，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无从下手。关于秋瑾的生年，当时学术界意见分歧，有四五种说法，主要的有三种：1875生年说、1877生年说、1879生年说。我原先是主张1875生年说的。60年代初我参加编写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中的“秋瑾”简介，1964年《秋瑾诗文选》中的《秋瑾年谱简编》，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我写的《试论秋瑾的诗》和《秋瑾与妇女解放》^②，都是认定秋瑾生年为1875年。

在20世纪70年代末，秋瑾1879生年说最为流行，故1979年全国学术界有纪念秋瑾诞辰百周年（1879—1979）的活动^③，不过我当时就认为此说最不可靠。因为它是根据福建云霄县一位百岁老人的回忆而引发出来的。这位96岁的老人说，1879年在秋瑾祖父官福建云霄厅同知

① 郭沫兰：《〈秋瑾年谱〉评介》，《东岳论丛》1984年第5期。

② 分别见《东海》（杭州）1962年7月号和《浙江日报》1963年3月6日。

③ 柯灵：《秋瑾烈士百年祭》，《中国妇女》（北京）1979年第11期。

时，家中生过一个女婴，她可能就是秋瑾。后经我多次致函政协福建云霄县委员会核对，明显漏洞甚多。^①1980年初，我看到《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上发布的一条材料，即秋瑾亲笔填写的与吴芝瑛义结芝兰时的《兰谱》，这是秋瑾本人留下来的一份考定她生年最有价值的史料。《兰谱》云：“年二十八岁，十月十一日卯时生。”此《兰谱》后由吴芝瑛的丈夫廉泉装成卷子，卷尾并附有1912年夏历6月4日吴芝瑛写给“秋社”主任徐自华的信云：“甲辰正月，芝瑛为烈士筹画学费，以便东游。烈士于人日写兰谱一通以来曰：我欲与姐结为兄弟。”甲辰是1904年，人日是夏历正月初七，由此知秋瑾1904年28岁，则生年当为1877年。这便是吴芝瑛的《秋女侠传》作卒年31岁的直接史料根据，我认为此说最可信。秋、吴拜交，此可征诸瑾诗《赠盟姊吴芝瑛》。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吴芝瑛与姊“结金兰之契，女士稍长，妹之”。而这一《兰谱》又系秋瑾亲笔填写，现藏杭州市文一街河西八号楼浙江省博物馆分部。1981年我专程去杭州看了原件，上印有秋瑾图章两枚，确有实物可证。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持秋瑾生于1877年说的四人——吴芝瑛、陶成章、冯自由、王时泽均与秋瑾有不寻常的关系。吴芝瑛与秋瑾的交往已如上述，兹不庸辞费。陶成章《浙案纪略·秋瑾传》写于秋瑾殉国后不久，全书成于1910年，此时秋瑾的许多战友、亲人尚在，易于了解查对其生年，而陶、秋二人早在1904年秋瑾留学日本时相识，她的结识蔡元培、徐锡麟以及内地会党首领多由陶氏介绍，秋瑾加入光复会亦系陶氏间接介绍（陶氏先介绍于徐锡麟，复由徐氏介绍她入光复会），故陶成章对秋瑾的了解当较确切。冯自由1904年秋曾在日本横滨亲自主持过秋瑾加入“三合会”的入会仪式^②，也当了解她的真实年龄。至于王时泽，因是时其母王勣（原名谭莲生）亦留学日本，与秋瑾同住一室，

① 详见吴秀峰、张瑞莹：《关于烈士出生地的考据》，《云霄县文史资料》第3辑。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排印本，第164页。

因其母的关系，故二人情同姐弟，接触较多。王时泽还确切地说明秋瑾比他“大九岁”^①。按《湖南历史资料》1980年第1辑重新刊布王时泽遗稿《秋瑾略传》时所加编者按云：“王时泽……一八八六年生。”准此，秋瑾当生于1877年。这四个与秋瑾过从较密、知之较深或有组织关系的朋友、同志，众口一词，均说秋瑾卒年31岁，生于1877年，又有《兰谱》为证，我认为1877年说比其他诸说可信。

确定秋瑾生年（1877年生）固然是年谱撰写中最关键的问题，但秋瑾生平，仍有诸多疑点需要考辨，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15点。

（一）1879年秋嘉禾在云霄任上所生女孙并非秋瑾；（二）赴台时间；（三）赴湘时间；（四）居长沙事；（五）嫁年；（六）居京岁月（兼辨秋瑾并非庚子前后两次居京）；（七）首次东渡为何时；（八）在横滨入“三合会”前秋瑾并未参加过“十人会”；（九）秋瑾重兴“共爱会”时间；（十）参加光复会先于同盟会；（十一）两次返国时间；（十二）离开浔溪女学时间；（十三）1907年春赴湘潭事；（十四）“秋雨秋风愁煞人”之真伪；（十五）就义日期。

至于有关烈士的一般史实和诗文系年，有分歧争议者尚多，诸如大通学堂体操专修科和秋瑾创设之体育会并非一事、秋瑾徐自华泛舟西湖时间、秋瑾与王金发最后在大通诀别时间、《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写于何时、《泛东海歌》作期等等。年谱对如上诸点均不回避，探源寻索，找出症结，本末兼察，折衷是非，务以征信为的。惟于传闻臆说，概不阑入，所谓“传其信不传其疑”（《戴东原集·与姚传姬书》）也。个别细末，宁付阙如，而不敢节外生枝。先师冯沅君教授曾引戴震语教我：“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戴东原集·答郑用牧书》）故我在考辨每一史实时，下笔之顷，往往踌躇者再，深患虑之不周、见之不博、考之不确定，以“己自蔽”蔽人，一恐贻误读者，二惧

^① 王时泽：《回忆秋瑾》，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页。

有辱师门。

《秋瑾年谱》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郭长海在《三十五年来秋瑾研究专著述评》中云：“第三本秋瑾年谱，是郭延礼编写的，一九八三年齐鲁书社出版。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年谱，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有些很独到的见解，看得出，作者是下了很深的功夫的。从秋瑾的先世族属、生平为人、往来友好、同志战友，乃至出嫁、居湘、赴京、留日，参加同盟会、闹取缔风潮、直到拂然归国，办教育、创女报，试制炸弹、联络会党，到坚持大通而被捕牺牲，凡诸问题，作者都有详细的记述。作者博见多闻，不仅掌握了秋瑾研究的绝大部分资料，而且涉足于近代史中的有关篇章，故而能从多角度来论述。其次，作者比较注意于考证，对秋瑾一生中十几个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以一定的史料为根据，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些见解发前人所未发。不能作结论时，取存疑态度，也不依违两可，不妄作结论。就目前来看，这是一本高质量的学术著作。”^①

三

我写的秋瑾研究的第三本书是《秋瑾文学论稿》，1987年8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秋瑾不仅是近代杰出的女革命家，也是近代杰出的女诗人，她出现在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即中国女性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期，在中国女性文学史和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向称诗礼之邦，妇女以吟咏著称于世者，代不乏人。有作品传世并能称文学家者，亦所在多有，如蔡文姬、左棻、鲍令暉、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吴江叶氏三姊妹、柳如是、汪端、顾太清等。但由于时代带给妇女生活范围的局限，她们吟咏的内容大多是风花雪月、离愁别恨，或闺中情爱、弃妇哀辞，其中虽也有涉及社会生活、

^① 郭长海：《三十五年来秋瑾研究专著述评》，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历史文化者，像李清照在咏史中吟出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等诗句，在古代女性文学中实不多见。而秋瑾能以豪放的调子，引吭高唱祖国之悲歌，并以自己宝贵的鲜血，凝成如此壮丽之诗篇者，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秋瑾是有代表性的第一位女诗人。就此而论，她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确实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秋瑾在文学上主要的成就固然是诗、词。但她的弹词、政论文也各具特色，都有一定的成就。我写《秋瑾文学论稿》，旨在从文学的角度探讨秋瑾各类作品的成就，特别是把它们放在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语境中，此时正值中国女性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期，其作品更具有重要的转型意义。如所周知，秋瑾是20世纪初女性政论文学作家群体中的佼佼者，她的政论文，是20世纪初女性政论文学的重要收获。尤其是她宣传妇女解放的作品，如《中国女报发刊辞》、《敬告姊妹们》、《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她不仅控诉了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和纲常伦理对妇女的迫害，特别是精神的奴役，而且正确地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途径：兴办女学，“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首先做到经济的独立，人格的独立，才能实现男女平等，这些都是卓识远见。特别值得提出的，秋瑾把妇女解放与当时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了起来，“在社会的总的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这不仅是秋瑾思想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也达到了那个时代妇女解放思想的最高水平，并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妇女解放运动给予正确的导向和积极的影响。从艺术形式上来讲，这些政论文多数是用白话写成的，像她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都是很流畅的白话文。她的那篇《敬告姊妹们》，郭沫若在1942年写的《娜拉的答案》中十分称赞这篇文章，赞它“文字相当巧妙”，并说：“这在三四十年前不用说是很新鲜的文章，然而就在目前似乎也还是没有失掉它的新鲜味。”^①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把秋瑾这类白话散文，放在

^①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00页。

“五四”时期的白话散文中绝不逊色。由此一面向，我们也可以看出秋瑾在文学上的成就。它如秋瑾的弹词《精卫石》，这是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作品。弹词中的主人公黄鞠瑞，不仅外貌毕肖秋瑾，而且从黄鞠瑞的家庭状况、婚姻不幸、留学日本，以及参加光复会等等情节来参照，也都是秋瑾本人的艺术再现。当然，文艺创作和作家生活并不能完全等量齐观。但秋瑾在这个艺术形象中概括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寄托着自己的革命理想，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人们通常把《精卫石》视为秋瑾自传体式的作品。这部弹词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故事情节的完整和生动，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并富有个性，语言的生动活泼、清新流畅，词汇的丰富、形象和富有生活气息，都是值得称道的。

关于秋瑾的文学成就，季镇淮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近代部分》中有一段很中肯的评价：

秋瑾在文学上的努力是多方面的。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写了相当丰富的作品，闪耀着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的光辉。虽然作品散失不全，也往往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在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学中，她的成绩确实在许多作者之上。她的作品绝大部分充满着英勇战斗、自我牺牲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精神。她是以沸腾的革命热血来写她的文学作品的，她把革命和文学完全统一起来了。^①

四

关于秋瑾研究的第四本书是我编辑的《秋瑾研究资料》（以下简称《资料》）。在秋瑾研究中，我深感资料的重要，一些问题的判断失误，主要就是缺乏史料的根据；或由于对史料缺乏必要的考辨，以至真伪混淆，得出错误的结论。鉴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匮乏，20世纪

^①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1页。

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室牵头，联合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发起了编写《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工作，《秋瑾研究资料》就是该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在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于1987年2月出版，它是这套丛书中最早面世的一种。

《资料》分为《秋瑾生平及其活动》、《秋瑾思想及作品研究》、《〈秋瑾集〉集外诗辑》、《悼念秋瑾诗文和纪事》四部分，另编有《秋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供研究者和读者参考，书末有附录十二个。在当时秋瑾研究资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这本资料集的出版对秋瑾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促进意义。

本书在资料的收录上掌握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注意资料的价值。本书收录的资料多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且多是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又多出自秋瑾的亲属、朋友和当事人之手，可信度高。例如瑾兄秋誉章的《悼璇卿长歌并序》，瑾弟秋宗章写的《六六私乘》、《六六私乘补遗》，瑾侄儿秋高写的《秋瑾遗事》，以及秋瑾生前好友徐自华、吴芝瑛、徐蕴华（小淑）、王时泽，以及陶成章、冯自由等人的悼念和回忆文章，都是写于秋瑾殉国后不久，具有很高的史料性和可信度。对于这类文献，《资料》尽量收录。

第二，在写作时间上，对于1949年之前难以寻找的资料尽量多收，如陶在东的《秋瑾遗闻》、赵而昌的《记鉴湖女侠秋瑾》，各种《诗文集》的序跋；而写于1949年后又容易找到的文章，择其有代表性的收录。

第三，为保证《资料》的准确、可靠，我对收入本书的所有资料逐一进行考查和鉴别。如秋宗章的几篇文章，对研究秋瑾的生平至关重要。我在收他的《六六私乘》和《补遗》时，因所据底本系上海图书馆所藏手抄稿和绍兴文管会所藏的油印稿，这两种稿本错字、脱漏较多，为此我又与秋宗章写的另一文稿《风雨楼痛语》（似为《私乘》的初稿或缩写稿）逐一校过。文中所引文字，凡可与《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

案》、《中国女报》、《神州女报》、《白话》、《秋瑾集》等书刊校对者，我均与原文作了校勘，并据原文改正，以期成为两种较可靠的史料。

再如，日本服部繁子的《回忆秋瑾女士》一文，过去虽也看到别人引用过，但并未看到该文完整的中文译文。我在编辑《资料》时，首先请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将刊登在《东西交涉》（季刊）第1年第3号（1982年9月15日出版）上的日文文本寄我，然后我请山东大学日语专业毕业的高岩同志翻译（我在文字上稍加润色），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无误，我又请山东大学教授、著名的日语专家金中先生复校，最后才收在《秋瑾研究资料》中。（顺便说一句，后来有些研究者编辑“秋瑾资料”却原封不动、一字不改地将该文收入，但并未注明译者和校者。）

该《资料》出版后，曾引起较大的反响，日本学者大里浩秋看到这本《资料》非常关注，他还在日本《邬其山》季刊（1988年秋季号）专门写了《评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文章说：“当我第一眼看到《秋瑾研究资料》一书时，心想这本书不过是锦上添花。及至我看了内容，才了解这本书不仅有难得的资料，还收进了比任何一种书都更多的研究成果。七百零八页的厚度，抵得上以上四种书（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的《秋瑾集》、周芾棠等编的《秋瑾史料》、陈象恭编的《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和郭延礼著的《秋瑾年谱》四种书——引者注）的三四倍。这是一本资料荟萃，为研究秋瑾不可缺少的资料集。”^①

五

秋瑾研究的第五本书是我的《秋瑾选集》（以下简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此书是我1982年版的《秋瑾

^①〔日〕大里浩秋著，高岩译：《评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其中文译文见《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34页。

诗文选》（以下简称《诗文选》）的修订本，但与《诗文选》也有了若干不同。

第一，《选集》所选的文本，较《诗文选》增添了两种文体：即书信（六封）和弹词《精卫石》，这样更能反映秋瑾文学创作的全貌。

第二，在注释方面，也有若干修正与补充。这里只举一例，如对“五月花”注释的修正。

秋瑾有《感时》诗二首，其第二首云：

炼石无方乞女娲，白驹过隙感韶华。

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

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

一腔热血愁回首，肠断难为五月花。

诗中“五月花”是什么呢？20世纪60年代，上海的柳文英教授解释说：“五月间盛开的百花虽然绚烂，但在因国事而悲愤的人们看来，反更触动愁肠。”^①80年代，北京的刘玉来先生在其《秋瑾诗词注释》中云：“五月花，美好的花。”以上二位先生均是从字面上解释“五月花”的。1963年，我在注释《秋瑾诗文选》时，在先师冯沅君教授的启迪下，我感到秋瑾这句诗中的“五月花”不是一般字面上的意义，而是用典。我注释为：“‘五月花’本是一只船的名字。1620年，英国一批清教徒为反对英国国教乘坐‘五月花’号船去美国。他们在到达美国朴茨茅斯港以前签订了一个共同遵守的契约，名为‘五月花契约’。该契约规定：上岸后大家保证互相团结，结成一个人民的政治团体，建立独立、自由的新社会。（见柯伯年主编《美国手册》第501页）秋诗‘五月花’用此典，非泛指五月的花朵。这里意为大家团结起来，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秋瑾亦可能有志建立一个团结留日革命志士共同反清的政治团体，而苦于难以做到。”^②对此，秋瑾研究专家

① 《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第105页。

② 郭延礼选注：《秋瑾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郭长海教授曾作了肯定的评价：郭延礼先生“‘五月花’一词解释就不囿于成见，指出它源于外国，并作了考证和阐述”^①。

1996年，我被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近代翻译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听到北京大学著名女学者夏晓虹教授的报告，她的文章题目是《斯托夫人与批茶女士》，文中提到我的《秋瑾诗文选》中关于“五月花”的注释。她引了我的注释后说：“郭先生的解释也算圆通，只是未免过于曲折。”晓虹教授指出“五月花”是一部小说名。她的意见引起了我的充分的注意。两年后（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重新编一部《秋瑾选集》，“五月花”的问题又提到了我的面前。我经过反复推敲，认为夏晓虹教授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参考她的意见，又重新作了注释。

五月花：是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1843年出版的一部随笔作品The Mayflower的中文译名。由于中国近代翻译界在译介美国这位作家的传记（《批茶女士传》）时有意无意的误译或读者的误读，把批茶（斯托父名Beecher不标准的音译）的《五月花》视为美国那位力主废除农奴制的作家斯托夫人所写的一部呼唤黑奴脱离苦海的小说。因此，批茶与《五月花》便成为近代读者心目中的女神和救世书，诚如《批茶女士传》中的译者在文末所说的：“我愿二万万女子，以批茶之事，为五月之花，而发生其热心也！”可以推想，秋瑾亦是批茶与《五月花》（按：将斯托夫人的另一部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误为此书）的误读者。她在弹词《精卫石》中就把批茶与女英雄罗兰、马尼他、苏菲娅同等礼赞：“余日顶香拜祝女子之脱奴隶之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其速继罗兰、马尼他、苏菲亚、批茶、如安而兴起焉。”秋瑾这句诗的意为：最痛苦的是，我难以像《五月花》的作者批茶那样写出一

^① 郭长海等著：《秋瑾事迹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